

从边防战士到考古学家,全国“最美退役军人”霍巍——

在荒原雪山中探寻厚重历史

■王子冰 李 林 本报记者 辛 悦

立春过后,“天府之国”成都平原绿意葱茏,到处一片生机勃勃。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(考古文博学院)学术院长、教授霍巍的眼中,家乡的春天不仅是原野中蕴含着蓬勃的生命力,更是一座城市创新发展的无限活力。

68岁,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已是安享岁月的年龄。然而,对于霍巍来说,一切好像才刚刚开始。

“时间的概念是人创造的,在新事物面前人

“我现在的一切,都是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”

接触考古之前,霍巍是一名驻守在祖国边防一线的战士,“雪林哨所”已成为刻进他生命的地方。

1977年1月,霍巍刚到部队不久,新兵班长便推荐他到团直属勤务队。为更好地锻炼自己,霍巍选择了到条件更为艰苦的边防哨所。

那时,部队正掀起练兵备战热潮,全团从各连抽调战士组建“尖子班”。军事素质拔尖的霍巍,成了班里唯一的新兵轻机枪射手。

虽说是新兵,但他的实力没有一个老兵敢轻视。为提升轻机枪点射的命中率,霍巍在老兵教学的基础上刻苦训练,不断琢磨动作要领,射击成绩大幅度提高。对此,老兵们都称他是“爱动脑筋又能吃苦的好兵苗子”。

由于军政素质突出,入伍第二年的霍巍,被任命为班长。那段时间,正值哨所搞基建,所需的砖块、水泥等建筑材料,都需要从山下运输。霍巍带领全班早早起床,每人揣俩馒头、带一壶水,就下山背运建材。十几公里的山路,每天只能走一个来回。

“当时心里只想尽快建好哨所,压根就没有感觉到累。”霍巍清楚记得,丛林里多是蛇虫鼠蚁,加上多雨路滑,搬运木材时,他们经常是扶着木材蹒跚前进。至今,他对背运路上的每块歇脚石仍记忆犹新。

霍巍个子大、体力好,每次背运都是第一个完成任务。为不拖延施工进度,他每天把自己背运的建材送到指定位置后,再返回接应班里的战友。有时进山伐木赶上雨天,运回一根木材特别艰难,甚至要一天一夜……

什么是苦?如今,已退役40多年的霍巍告诉记者:“吃过当兵的苦,往后遇到啥事都不叫苦了。”

高考制度恢复后,霍巍以优秀班长身份参加了全国统考,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。上学期间,他所在连队的战友为保卫祖国,都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边境作战。获知消息后,霍巍一方面为自己不能与战友们并肩战斗而遗憾,另一方面也为他们的安全担心。

然而,噩耗还是传来了。霍巍辗转从战友处得知,在一次战斗中,老连队里和自己最要好的一名战友负伤后牺牲。



不分年龄,考古人永远年轻。”霍巍的声音带着军人特有的坚定,浑厚中透着沉稳执着。

岁月不掩儒雅,白发仍是少年。这位从边防哨所走出来的考古学家,曾经多次拨开岁月风尘,捡拾那些飘落的历史散叶,让未知的历史不再停留于传说和想象,让一件件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,展现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、光辉灿烂的华章,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见证。

仍无所获。有人说:“你们想找的东西,法国人在印度境内找了一个世纪都没找到,放弃吧!”

“走!不走?”李永宪问。

“走!正因为没有路,更要留下自己的足迹,这样后人才会有路走。”霍巍的坚定,一如当兵时。

正当俩人在野岭荒原中苦苦探寻时,吉隆县宗嘎乡乡长罗桑的一句话,让俩人眼前一亮:“馬拉山口正修水渠,崖壁上有一块刻着汉字的石头,你们快去看看,不然就被炸啦!”

这块涂满酥油、挂满哈达的石头,就是“大唐天竺使出铭”,是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和他的使团出使印度经由此地时所刻下的,被誉为“20世纪以来中印和唐蕃交流史上最重大的考古发现”。

当霍巍和同事刷干净石刻后,他知道自己叩开了西藏考古新发现的“大门”。

“虽然跋涉于荒丘,但正是我所向往的热土。”霍巍参与西藏考古30多年,白发不知不觉爬上了双鬓。他从“大唐天竺使出铭”开始,史前的“细石器”、比文成公主进藏历史更早的丝绸、茶叶,来自中原和中亚各地的青铜器、金银器、珠宝、香料等不断被探知、发现。它们褪去历史的风尘,将西藏的前尘往事娓娓道来,让神奇瑰丽、扑朔迷离的西藏历史文化,不再停留在“据说”和“相传”。

1992年,西藏的文物普查工作告一段落,但霍巍还有个心愿未了。那就是西方学者曾说过的“西藏没有石窟寺”。

“这一地区除了分布广泛的摩崖龕像,几乎没有一座大型的石窟,这是中国佛教石窟发展链条上‘缺失的一环’。”心存疑惑和不甘的霍巍,从未放弃过寻找。

一次,霍巍和李永宪率队结束调查。在返回住地的路上,他们遇到了一个牧羊少女要搭车。霍巍随口问了一句:“你放羊的时候,有没有见过有画的山洞?”少女点点头。

霍巍大喜过望,跟着少女来到一处断崖,一抬头惊呆了:密密麻麻的洞窟好像蜂巢一般,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崖壁上。

霍巍带着考古队员手拉着手爬上崖壁。当走进其中一个洞窟时,他的眼泪几乎流下来:中原风格的龙凤、波斯风格的双狮、克什米尔风格的神佛、菩萨……洞窟中的壁画历经千年而弥新,在壁画大量采用青、绿为主的冷色调,含蓄而内敛,让人联想到了龟兹克孜尔,想到了丝路敦煌……

这就是被誉为“高原敦煌”的东嘎-皮央石窟群,霍巍曾心心念念的佛教艺术发展“链条”中的重要一环,终于补全了。

近年来,霍巍在多年学术积淀的基础上,又提出了“高原丝绸之路”这一概念,极大丰富了“丝绸之路”的内涵。这一系列发现,对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,具有重要意义。他和他的团队获批中央宣传部、中央统战部、国家民委、教育部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”研究基地,在三星堆考古、西南考古等领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,为展示中华文明风采,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。

“历史是我们面对未来的底气,而考古是我们观察历史的眼睛”

刚刚过去的蛇年春节期间,四川广

汉三星堆博物馆以其丰富的文物展览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,吸引了大量游客。博物馆推出的古蜀文明探秘、文物修复体验等多项特色展览和相关活动,让游客们在参观中深切感受古蜀文化的魅力,享受了丰盛的文博大餐。

在这些琳琅满目的国宝级文物中,有一件被网友称为“月光宝盒”的青铜器,就是霍巍命名的龟背形网格状器。

霍巍领衔的三星堆考古团队,全面参与了三星堆遗址的5、6、7号祭祀坑的发掘工作,并取得重大突破。如今,看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热衷于历史和考古,霍巍颇感欣慰:“历史是我们面对未来的底气,而考古是我们观察历史的眼睛,年轻人热衷于逛博物馆,折射了对传统文化的认同。”

“志之所趋,无远弗届,穷山距海,不能限也。”参与西藏考古以来,霍巍一直在寻“路”。这条路不只是无人区里未知的方向,不只是不同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通道,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之路。

霍巍还在求学时,考古学界中有人“言必称西方”。而他则始终传承着四川大学几代人苦苦探寻的目标,坚持在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基础上,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之路。

2013年夏天,正值阿里高原的雨季。霍巍和学生全涛在象泉河流域调查时,发现一辆卡车把路面碾出一个大坑并陷入其中。他组织大家齐心协力把卡车抬出来时,发现大坑底下竟然是一座墓葬。

随后,考古队员在墓主人头部附近的丝绸上发现了“王侯”两个汉字。这引起了霍巍极大的兴趣:因为带着汉字的丝绸,不可能是当地出产的,极有可能是中央王朝赠予当地贵族首领的礼物。紧接着,他们又发现了茶叶状残渣。经碳十四测年距今1800年左右,成分与汉景帝阳陵中出土的茶叶完全一致。

“我们的历史书上写着,唐代文成公主入藏,第一次给西藏地区带去了茶叶。但在这次考古发掘中,却发现了汉晋时代的茶叶,比文成公主时代还要早几百年。”霍巍说,“这难道不是一种很奇妙的收获吗?”

在霍巍的高原考古之路中,这样的“奇妙收获”确实不少。当他把越来越多的考古线索联系到一起,一个崭新的概念渐渐在他的头脑中建构起来。在霍巍看来,青藏高原与中原内地,山河阻隔,假如没有贸易或人员交流,很难想象有这么多的巧合。在西藏考古发现的证据,充分证明“青藏高原丝绸之路”的存在。

“耕耘在祖先耕耘的土地上,走出自己的路、说出自己的话、尽到自己的责。”霍巍说,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,不断弥补在田野考古方面的短板,在山地考古、西南考古、道教考古、藏传佛教考古等领域独树一帜,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理论和方法。

从边防哨所到天府之国,背负着牺牲战友的期望前行;从川西盆地到青藏高原,挥洒着饱蘸铁血的书生意气;从西方理论到中国学派,传承着独树一帜的考古之路。霍巍像极了一个“白发”的少年,永远保持着一颗赤诚的初心。眼下他最大的心愿,是到云南边防的烈士陵园,在战友墓碑前敬献一束盛开的山茶花,同时放上一块采自雪域高原的白色砾石,以此陪伴长眠于此的战友。

这种常常用来铺路的石头,正像霍巍和他的战友们一样,将自己的梦想与中国梦结合起来,共同铺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。



图①:霍巍(左一)在西藏考古现场。
图②:霍巍在边防某部服役时留影。
图③:霍巍(右二)在实验室为学生讲解。
图④:霍巍团队在三星堆发掘时清理5号坑金面具。
图⑤:霍巍(右)带研究生进行考古调查。
本版照片由霍巍提供

版式设计:扈 硕